

第四卷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

山东人民出版社

顾 问

苗枫林 黄楠森 吴建国 刘蔚华
顾锦屏 陈筠泉 徐经泽 何祚榕
吕明灼 贾泽林

主 编

王文英 燕宏远 林辉基 孟庆仁

责任编辑

祁秀生

3110 / 3234
of

目 录

导言	(1)
卢卡奇	燕宏远撰 (17)
葛兰西	田时纲撰 (113)
陶里亚蒂	毛韵泽撰 (189)
贝林格	田时纲撰 (231)
河上肇	宗 山撰 (279)
户坂润	<u>刘及辰</u> 撰 (319)
永田广志	王宁华撰 (379)
铁托	柴方国 吴仕康撰 (421)
卡德尔	邵滨红 柴方国 吴仕康撰 (475)
涅德里科维奇	吴仕康撰 (531)
康福斯	涂纪亮撰 (583)
克劳斯	梁志学撰 (629)
阿尔都塞	王荣栓撰 (675)

导 言

本卷评述了欧洲和日本部分活动于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13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们虽出生于不同的国家，又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但他们都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共同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也对很多人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十月革命的激励下，卢卡奇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逐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从社会党分裂出来，创立了意大利共产党。铁托、卡德尔、克劳斯也在十月革命后一些年代里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一切，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和实践中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

本世纪初，世界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不仅西方国家发生了革命，东方也发生了革命，而且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了一个广泛传播、具体实践和大发展时期。但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发展也就出现了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局面。卢卡奇、葛兰西、铁托等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鲜明特征。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重要贡献，就是力图“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来解释马克思的学说”，保卫了马克思主义免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进行庸俗机械论的歪曲，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阐发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产阶级意识的重大作用。此外，他在不知道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从分析商品出发详细探讨了异化问题，从马克思的思想出发突出强调了“总体”和“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也因其中有某些主观化倾向的理解和表述不清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批判。卢卡奇在苏联一段较长的时期里，深入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认识到并清算了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观点，从而完成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转变。此后，他在自己所熟悉的哲学史、文学艺术评论和美学领域里，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在研究社会存在本体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对斯大林某些错误的批评等方面，都创造性地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尤其是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写出了一系列很有份量和重大影响的名著。他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声望，大多数学者认为他是当代最著名、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

在意大利，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之后，葛兰西、陶里亚蒂、贝林格代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路线。

葛兰西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欧洲及其他国家都受到普

遍的尊敬。葛兰西的著作和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科学理论贡献，而且也是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

在葛兰西之前，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曾为坚持和阐发唯物史观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葛兰西继承了这一传统，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在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他在二、三十年代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论有广泛影响的情况下，正确地强调了认识的主体性和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他针对克罗齐的历史唯心主义和一些人的直观（庸俗）唯物主义，提出了“实践一元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紧密结合，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来把握。

葛兰西在肯定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主体（意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他根据西方、尤其是意大利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和阐明了领导权的理论、阵地战的战略、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重大问题。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既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又反对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在意大利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解和发展，并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灵活地运用于意大利的特殊情况，从而推进了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陶里亚蒂继葛兰西之后任意共总书记，并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是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他在哲学观点方面同葛兰西大致相同。他在接受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既对第二国际一些领导人的“宿命

论”深恶痛绝，也对克罗齐的唯心主义持批判态度，因为他认为克罗齐的哲学是思辨哲学，“全部是超然存在和神。”

陶里亚蒂主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活动，因此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意大利革命的具体实践方面。还在1919年意大利发生革命时，他就设想把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意大利的“工厂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意大利的具体情况，提出通过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他所说的民主是“要使人民的意志成为真正决定政治发展的因素，使它深入到经济生活，从而也深入到整个文明社会的组织中去，并改变这个组织”。所以，他既重视一般的民主运动，也清醒地看到，只有更换社会和国家的领导权，社会性质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苏共二十大后，陶里亚蒂根据列宁关于任何革命都必须适合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提出“多中心论”，即由于各国党遇到的问题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势，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中心。他不同意照搬苏联的经验，因为在他看来，由于民族特点和国情不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不同的国家中必然有自己的特点。

继葛兰西、陶里亚蒂之后担任意共总书记的贝林格，也遵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意大利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探索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贝林格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在于，强调共产党人的努力“不是从先验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社会和人物的实际问题出发。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来都没有以纯

粹的状态存在过，而总是存在于由历史决定的个别事件中”。正是根据这一思想，他拒绝有一种适用所有情况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他依据意大利的特殊情况，提出“历史性妥协”的战略思想，后来又进一步主张通过民主代替天民党执政的办法来实行独立的、多元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把这一思想的适用性扩大到整个欧洲范围，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设想。他建议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应探索一条与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同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条道路既完全符合各个民族的特点和传统，又完全符合欧洲大陆这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这是一种通过民主道路在欧洲发达国家实行以社会主义方向的变革为目的的战略。他这种设想正确与否，还有待进一步由实践来检验。

在对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意见分歧问题上，他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辩证观点。他坚持隆哥的在“多样化中求团结”的原则，主张在国际共运中组织耐心认真的讨论，以便求同存异。他坚持认为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承认每一个党都有权自主地制定和充分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国内国际政治路线这个基础之上的。但这并不排除对别国党的理论观点或政治观点也有判断的自由，各党可就工人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但讨论要本着友好和理解的精神，坚决反对给任何与自己不同的立场武断地扣上这种意义或那种意义上的修正主义帽子。

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河上肇、户板润、永田广志就是这一时期的开拓性

的代表人物。河上肇从1905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的思想,随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从1924年起以“全部力量来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至1928年完全转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来,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唯一出路,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把它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实践对理论的重要作用,是河上肇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户板润和永田广志成熟于本世纪30年代。这期间,苏联哲学讨论的积极成果,尤其是列宁关于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同一的观点,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们确认“哲学的列宁阶段”,为在日本传播、维护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的哲学思想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此外,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对日本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对作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日本主义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当然,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表述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他们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免有点简单和局限性,永田广志也受到斯大林错误观点的某些消极影响。但有人从否定的意义上把他说成是“日本的米丁=斯大林型哲学家的典型”,这未免有点过于偏狭。

铁托、卡德尔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主要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独立自主地探索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出具有南斯拉夫民族特色的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是他们把马列主义运用于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铁托、卡德尔提出并实行自治的社会主义,是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

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列宁也指出，“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工人阶级的威信已经树立，社会主义才能够形成和巩固”，主张“使真正的全体人民都学会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正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铁托、卡德尔认为，劳动人民和公民直接参加解决一切问题是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实质。他们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这一论断，区别和分析了社会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优劣利弊，主张逐步由国家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他们看来，社会所有制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创造并管理社会生活，意味着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生产资料是社会和全民的财产，自然就必须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这是避免官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问题就是使劳动者和公民在作出最重大的决策时能发挥直接的影响作用。

铁托、卡德尔虽然强调工人以至劳动者的自治，但他们并没有否定，而是明确肯定工人阶级的社会领导作用，共产党现在和将来都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先锋力量，以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确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保证社会民主并在社会主义自治范围内为民主化开辟广阔道路的政体。他们并没有把自治问题绝对化，而是同时指出社会主义要以人民政权为后盾，也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在自治方面又提出了联合劳动一体化的思想。

涅德里科维奇是南斯拉夫老一辈最有名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直坚持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唯物辩证法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和最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他高度评价列宁的历史功绩,确认列宁关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他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也反对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肯定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致力于实现辩证唯物主义者人道主义化和当代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化。充分强调实践是一切人的认识的基础、出发点和源泉,也是涅德里科维奇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比较早地重视人、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问题,是铁托、卡德尔、涅德里科维奇的思想的共同特征。铁托、卡德尔强调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活生生的人,为了解放劳动和工人阶级,为了人的美好生活 and 幸福,为了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人成为自己生活和劳动的真正主人。涅德里科维奇特别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以往一切人道主义的区别,指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它必须是具体的,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解放全人类,建设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

康福斯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在战后斯大林的影响达到高峰时开始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他把斯大林视为继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也接受了斯大林的一些机械论的观点,但他不

仅没有接受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上是辩证的，在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这种观点，反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质和它的唯物主义性质是分不开的”。他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成就是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为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科学制定了一些基本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致力于如何改造社会，使生产力造福于人类。因而，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是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苏共二十大后，康福斯觉察到有些人对共产主义原理的理解一定有某些错误，认识到苏共远不是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监护人。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有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对此也应作批判的考察。有人曾因此而认为他后期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他对此反驳道，即使如此，他所修正的也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它们是不需要修正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康福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一点也明显反映在他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态度上。原来他对西方哲学基本上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有时简单地、武断地下一些不恰当的结论。60年代以后，他改为采取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的态度，肯定西方哲学中的积极因素，批判其中的错误观点。例如，他一方面看到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在考察形式逻辑和语义学问题以及使用语言等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哲学只对语言使用作出描述，而不提世界观。在批判有很大影响的批判理性主义创始人波普尔时，既肯定他对科学方法原则的研究是重要的和富有启发性的，也尖锐地驳斥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本质上对比了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优劣，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原来的学科处处有新的突破，新的科学理论层出不穷，新的技术不断涌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日新月异。这一切必然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急剧变化，其中哲学思想尤为活跃。资产阶级哲学对这一切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也就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观点掺加进来，甚至借此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和回答，并在研究和争论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面前的中心任务。原民主德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克劳斯比较早地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而又严肃认真的探讨，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教条主义还颇为盛行之时，他已经开始提出和研究了一些充满时代气息的迫切问题。例如他1957年就不同意把数理逻辑当作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取消的教条主义态度，并明确指出，对待数理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并不象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几年前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反对数理逻辑本身，而在于反对数理逻辑中的唯心主义。克劳斯在控制论的研究和探索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尤为引人注目。当资产阶级哲学家滥用这门新兴学科的重大成就，作出反对唯物主义的错误结论时，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哲学家则宣布控制论是现代机械论，把它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克劳斯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坚决反对这两种极端，既批判资本主义国家里盛行的对控制论所作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解释，如认为机器能

思维，也批判社会主义国家中某些哲学家否定控制论是一门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他坚定地认为，控制论是研究开放的控制系统的科学，是我们星球上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和精神发展过程的重要基础之一。克劳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中比较早地认识到控制论对现代社会以及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大意义的少数人之一。

苏共二十、二十二大对法国共产党产生了尤为强烈的影响，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出现了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因而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针对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人本主义化”的解释倾向，法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为“保卫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对马克思的学说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必须去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据”，为此，“我们今天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公开地提出这些问题，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①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双重成果是，他“在创立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阿尔都塞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他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思想，正确地断言在社会中存在着“有结构的复杂统一体”，并把这种社会结构的概念提到首要地位。进而，~~他根据马克思的思想~~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12页。

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论断，提出“多层次决定”（或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他详细论证了经济因素所起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各因素如何发挥特殊效能的问题。这里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与结构主义在本质上是 inconsistent 的。他在其主要著作《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中主要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学说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并以此反对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其他一些哲学唯心主义的表现。这是阿尔都塞的思想主流或主要倾向。为了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机械的和唯心主义的歪曲，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意义或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他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得出了比较全面的哲学结论，认为革命取得胜利不是仅仅由于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矛盾的作用，而且还由于其他的、起多层次决定作用的矛盾对它的总的作用。

阿尔都塞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他的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论述，正确地反对了抽象的人道主义，但他片面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断言马克思在1945年有一个从意识形态（人道主义）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裂”，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一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激烈的争论和批判。这一观点和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这种

仅仅从结构方面来反对从历史方面考察社会的方法，显然是阿尔都塞受了结构主义影响的突出表现。这并不像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仅仅是“同结构主义术语的‘调情’超过了所能允许的限度”，而是明显违背马克思思想的原则性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经过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因此在全面评价他的哲学观点时，虽然必须明确指出他的一些严重的倾向性错误，但不应把他归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列，而应把他视为有过结构主义偏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上述哲学家，他们各自都有明显突出的特点。由于各人的情况不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阐释和贡献也有所差异。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有的人把它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人把它称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或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一元论。有的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体的能动方面，有的人则强调它的唯物主义的或科学的方面。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倾向或学派。有的人主要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理论问题。有的人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所遇到的种种理论问题。有的人在文学艺术、美学、民主、人道主义等方面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有的人则在逻辑学、控制论等一些领域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既反对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或教条主义的解释。

本卷中所评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特点，充分证实了列宁的论断的正确性。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

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应用于不同国家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特点里，才更具体地体现出它的普遍指导作用和强大生命力，显示出它的日益深化和新发展。

由于本卷所评述的人物面临的都是现实中人们最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在探索中必然出现一些不同的观点或失误，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往往引起重大的分歧、争论或批判。如20年代围绕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争论和批判，40年代末至50年代南斯拉夫和苏联等国之间关于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争论，60至70年代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也参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争论等等。尽管在这些争论中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或偏差，但它对促进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争论和事实证明，卢卡奇并不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铁托、卡德尔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决非像共产党情报局在40年代末所指责的那样，“执行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是“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61页。